

“经典重估”的方法论建构——《经典重估与西方文学研究方法创新》评析

The Method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Canonical Reevaluation: On *Canonical Reevaluation and Innovation in Western Literary Research Methods*

刘 松 (Liu Song)

内容摘要：蒋承勇的专著《经典重估与西方文学研究方法创新》在经典重估的理论自觉、方法论建构和实践转化三个层面作出了系统性探索。本书突破了本质主义经典观，确立了经典的历史生成性和跨文化建构性；在研究方法上构建了微观文本细读、中观思潮谱系、宏观理论反思的三重架构；在实践层面将原型批评、叙事学、跨文化传播学等多元方法有机融通，形成了可操作的研究范式。该著不仅为“重写文学史”提供了方法论资源，也为比较文学学科建设贡献了理论范式，体现了当代人文学术从理论移植到方法论自觉的学术转向。

关键词：蒋承勇；《经典重估与西方文学研究方法创新》；经典重估；经典化；比较文学

作者简介：刘松，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典籍翻译、比较文学、人工智能翻译研究。

Title: The Method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Canonical Reevaluation: On *Canonical Reevaluation and Innovation in Western Literary Research Methods*

Abstract: Jiang Chengyong's *Canonical Reevaluation and Innovation in Western Literary Research Methods* offers systematic exploration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of canonical re-evaluation, method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The work transcends essentialist views of literary canon by establishing the historical generativity and cross-cultural constructiveness of classics. Methodologically, it constructs a triple framework encompassing micro-level close reading, Meso genealogy of literary trends, and macro-level theoretical reflection. In practice, it organically integrates archetypal criticism, narratology,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to an operational research paradigm. This monograph not only provides methodological resources for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but also contributes theoretical paradigms to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anifesting the academic turn from theoretical transplantation to methodological consciousness in contemporary humanities scholarship.

Keywords: Jiang Chengyong; *Canonical Reevaluation and Innovation in Western Literary Research Methods*; canonical reevaluation; canoniza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uthor: Liu Song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129, China). His main research areas include classical Chinese text transla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AI-powered translation (Email: songjay@hnu.edu.cn).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深度交织的当代，文学经典的合法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各种“文学终结论”不乏夸张成分，但文学边缘化的趋势确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正是在这种时代语境中，“经典重估”成为国内外学界的强烈呼声。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需要重估经典，而是如何重估经典——需要何种理论支撑？遵循怎样的方法论路径？如何避免理论喧宾夺主与脱离文本的经验化倾向？

蒋承勇《经典重估与西方文学研究方法创新》¹（以下简称《创新》）一书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系统回应。该著并未止步于对既有西方文学经典的再阐释，而是力图建构一套贯通理论反思与实践操作的方法论体系。全书除绪论和后记外，分上、中、下三编：上编聚焦作家作品研究，从古希腊喜剧到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涵盖不同时代经典文本；中编专注文学思潮研究，对19世纪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颓废派等六大思潮进行系统考察；下编致力于理论反思，探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西方文论接受、世界文学观念等重大理论问题，形成了从微观到宏观、从实践到理论的方法论自觉。

《创新》独特价值在于其理论视野的整体性与方法论建构的系统性。三编内容看似相对独立，实则构成有机整体：微观作家作品研究为思潮考察提供文本基础，中观思潮研究为文本阐释提供历史视野，宏观理论反思则提供方法论指导。这种点-线-面的立体架构，超越了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为经典重估提供了多维度实践路径。本文将从经典观理论转向、方法论三重架构、多元方法融通转化、学术贡献与学科意义四个维度，系统阐释《创新》在经典重估领域的方法论建构及其学术价值。

一、从本质主义到历史生成：经典观的认识论转向

《创新》在理论层面的贡献在于完成了对传统本质主义经典观的批判性

1 参见蒋承勇：《经典重估与西方文学研究方法创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超越。本质主义经典观将经典视为具有永恒价值的文本，这一观点在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 1994）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布鲁姆强调文本的审美价值是其成为经典的根本原因，并试图建立一个以莎士比亚为中心的“稳定经典谱系”。¹

然而，这种本质主义立场忽视了经典生成的历史和社会因素。《创新》明确反对这种静态经典观，指出，“文学经典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变迁、文化变更、审美趣味转换而不断调整、流动”（1）。这一动态经典观的确立，并非简单理论宣示，而是建立在对经典生成机制的深入考察之上。该著指出，“文学经典的产生是多因素合力结果，既得益于作者对文学传统的创造性承续以及个性化超越，也得益于作品问世后读者与评论者的阐发推介所形成的阅读效应，还得益于不同传播媒介的传播效应”（3-4）。这一论述将经典生成置于创作-接受-传播完整链条中，揭示了经典地位的建构性本质，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艺术的法则》（*The Rules of Art*, 1996）中关于文学场域权力关系的论述相呼应。²

譬如，上编第五章《〈简·爱〉经典化过程考论》详细考察了《简·爱》的经典化过程。首先是“多元融合”，揭示该小说如何融合哥特式小说、成长小说和浪漫小说等多种艺术元素；其次是“阅读评论”，考察批评家和读者接受如何提升作品经典地位；最后是“媒介传播”，分析不同传播媒介如何拓展和延伸作品经典性。通过这一经典个案分析，清晰地展现了经典并非作品固有的本质属性，而是在创作、接受、传播的多重互动中逐渐生成。

此外，《创新》还揭示了跨文化语境中经典再生成机制。该著指出，“外来文学与文化的本土化过程，并非对文学与文化的直接吸纳和接受，而是一种经由本土人文价值观和审美价值观的民族期待视野进行选择性与传播的过程”（7-8）。上编第六章《马克·吐温之中国百年传播考论》和第七章《安徒生童话之中国百年传播考论》，通过历时性考察充分展现了这种跨文化再生成机制。以安徒生童话为例，该章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读者对安徒生的不同理解，儿童本位的热与冷、现实性和批判性对童心的遮蔽、童心的回归与“安徒生印记”。这种接受史的曲折变化，恰恰证明了经典意义的历史建构性和跨文化生成性。

经典观的这一认识论转向，为《创新》的方法论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如果经典是历史生成的、跨文化建构的，那么经典重估就不能满足于对经典文本的简单重复阐释，而必须在方法论层面实现创新，既要回到文本本身进行深度细读，又要将文本置于历史语境和跨文化传播复杂网络中加以

1 参见 Harold Bloom,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94.

2 参见 Pierre Bourdieu,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translated by Susan Emanue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考察，还要反思阐释经典所依凭的理论框架本身。

二、三重维度的方法论架构：点、线、面的辩证统一

《创新》的突出贡献在于建构了一个点-线-面三位一体的经典重估方法论体系。上、中、下三编分别聚焦微观文本阐释、中观思潮考察、宏观理论反思，并非简单的内容分类，而是体现了作者对文学研究不同层次的方法论自觉。这一方法论架构的形成，深刻回应了当代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困境，即要么过度依赖西方理论，导致“理论驾驭文本”；要么脱离理论的纯文本解读，缺乏理论深度。《创新》三位一体架构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既不放弃理论视野，又不脱离文本实践；既重视微观细读，又不忽视宏观思考。

（一）微观层面：作家作品的深度阐释

在微观层面，上编通过对不同时代、不同风格作家作品的深入研究，展示了文本细读的方法论价值。全书第一章《“诗性”的经典》，包含十个小节，涉及多部经典作品的阐释。这些研究超越了传统主题分析和人物解读，而是从文学“诗性”与“人学”双重维度切入，既关注作品对人性的探索，又重视其艺术表达的独特性。

第二章对阿里斯托芬喜剧风格的研究，从主题的现实性、政治讽刺的尖锐性、情节的荒诞性三个维度，揭示了古希腊喜剧的艺术特质。第三章《“拜伦式英雄”与“超人”原型》通过对拜伦创作的心理原型考察，揭示了“拜伦式英雄”与尼采“超人”哲学的精神关联，将拜伦置于从19世纪到20世纪现代性思潮演变的宏大视野中加以考察。

第四章《狄更斯小说经典性的别一种重读》从阅读趣味、故事性与娱乐性以及儿童心理、童话式叙述与通俗性两个维度，重新审视狄更斯小说的经典性，挑战了将经典等同于“高雅”的传统观念。这种“别一种重读”彰显了经典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思想深度，也在于其艺术感染力和大众接受度。

第八至第十章对劳伦斯小说的研究充分运用了叙事学方法。第八章分析《儿子与情人》的现代主义倾向，从心灵展示、情节淡化、象征神秘性、语言意象化等多个维度揭示其艺术创新。第九章探讨《虹》的多重复合式叙述结构，揭示外部现实与内在历程的“对位”关系。第十章研究《恋爱中的女人》的深度对话，分析人物对话如何超越情节推进功能，成为探索人性深层矛盾的哲学对话。

这些微观研究的共同特点是方法的灵活性和阐释的深度性。根据不同作品特点选择合适切入点和分析方法，既避免了社会学批评的简化，又超越了形式主义批评的封闭，实现了思想内涵与艺术形式的有机统一。

（二）中观层面：文学思潮的谱系学考察

如果说微观层面的文本细读关注的是“点”的深度，那么中观层面的文学思潮研究则致力于揭示“线”的延展。中编对19世纪西方文学六大思潮（浪

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颓废派)的系统考察,构成了该著方法论建构的重要维度。

《创新》对文学思潮的研究,体现了鲜明的谱系学(genealogy)方法论特征。这种方法虽受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谱系学思想启发,但并非简单移植,而是将其创造性转化为文学史研究的具体方法。谱系学方法拒绝将历史视为线性进化的过程,而是强调历史的断裂、偶然性和权力关系。《创新》对文学思潮的考察,正是在断裂中寻找关联,在差异中发现“传承”。

中编第十一章首先反思了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的历史境遇,指出中国学界对不同思潮的“选择性接受与研究的非均衡性”,并考察了西方学界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为后续各章具体分析提供了学术史背景。

第十二章《浪漫主义之中国百年传播考论》追溯浪漫主义在中国的“时代风潮中的沉浮”,指出浪漫派与启蒙运动及法国大革命的关系是传承抑或反叛,并对“自由”内涵的多义性进行细致辨析。这种历时性考察揭示了文学思潮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意义转换。

第十三至十五章对现实主义的研究尤为深入。第十三章探讨“‘主义’的纠结与纠缠”,深入剖析了作为“创作倾向”的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关系。第十四章《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写实”传统及其当代价值》提出了极具创见的理论洞见,将“写实”界定为一个“变数”概念,而非固定不变的创作原则。该章还揭示了“写实”传统与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的关系,并论述现实主义的当代价值。第十五章《现实主义中国70年传播考论》则考察了现实主义在中国从“功利性”到“工具”与“口号”的演变,回答了“现实主义被‘独尊’了吗”这一重要问题,并尝试拓展现实主义传播空间的可能性。

第十六章对唯美主义思潮的研究,系统考察了“艺术高于生活”与“逆反自然”、“艺术自律”与“为艺术而艺术”、“形式”的自觉与“感觉”的描写、“艺术拯救世俗人生”与“感性解放”等核心理论命题及其在创作中的体现。第十七章则对西方颓废派文学进行再认识,从宗教领域的“世俗化”、知识领域的“内在化”、社会领域的“工业化”三个维度揭示其文化渊源与文学价值。第十八章《象征主义之中国百年传播考论》追溯象征主义传播的发生、调整、滞缓与扩展、复兴等不同阶段,并展望其未来。

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将文学思潮置于文化史、思想史的宏观视野中考察,揭示不同思潮之间的内在关联,拒绝将19世纪文学史视为一个个孤立思潮的简单排列。蒋承勇强调,西方诸多文学思潮在外表的“断裂”式差异中存在着人文-审美的深度关联,由此构成“血脉相连的文学史有机整体”(266-267)。这种谱系学的考察方法,对于“重写文学史”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三) 宏观层面:理论批评的反思性重构

《创新》方法论架构的第三个维度,是对文学理论本身的反思。下编“研

究理论与方法创新”并非抽象的元理论思辨，而是紧密结合中国学界外国文学研究的实际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第二十二章《走向融合与融通：跨文化比较与外国文学研究方法更新》比较了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下的“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个二级学科内涵，探讨了融合、融通与文学世界主义的关系，有效回应了2017年学科目录调整后的学科建设问题。

第二十三章《现当代西方文论中国接受之再反思》分析了理论热与理论失范、理论热与理论匮乏的悖论，探讨“主观预设”与理论引领的关系，以及“回归文学”与“场外征用”的张力。蒋承勇指出，反对“理论喧宾夺主”并不意味着拒斥理论，“真正做到从文本出发需要更深厚的理论素养作为支撑”（428）。

第二十四章《“世界文学”不是文学的“世界主义”》对世界文学概念进行了重新梳理，探讨了何谓“世界文学的时代”、何谓“世界的文学”，反思“世界文学”是否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深刻分析了网络化-全球化是否意味着文化一体化，以及比较文学是否抗拒世界主义。作者指出，“世界文学并非消解民族特性的大一统，而是带有不同文明与文化印记的多元化民族文学共生共存的联合体”（463）。

其他章节还涉及文学“能量”说（第二十五章）、文艺复兴运动的潜文化意义（第二十六章）、18世纪以降英国小说演变的跨学科考察（第二十七章）、批评家与作家的“恩怨”及其启示（第二十八章）等重大理论问题。这些研究都体现了对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等基本问题的反思。

这三重维度的方法论架构，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形成了有机整体。微观文本细读为中观的思潮考察提供了坚实文本基础，中观思潮研究为微观文本阐释提供了历史视野，而宏观理论反思则为前两个层次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自觉。这种立体化的研究范式，构成了《创新》最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

三、多元方法的融通与转化：实践范式的创新性探索

《创新》不仅提出了方法论构想，还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的深入研究，展示了多元方法融通运用的可操作性。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成功转化，使其成为一部真正具有示范意义的学术著作。

《创新》对多元方法的运用，并非简单拼凑或堆砌，而是基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进行有机整合。正如该书绪论中所强调的，“方法论的选择必须服从于研究对象的内在逻辑，不同的文学现象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而复杂的文学现象则需要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21）。这种方法论融通的能力，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和开阔的理论视野。

（一）原型批评、叙事学与传播学方法的综合运用

《创新》在方法运用上的创新，突出体现在将原型批评、叙事学、跨文

文化传播学等不同理论范式有机结合，形成了多维度研究视角，在对拜伦、劳伦斯、安徒生等经典作家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对拜伦的研究是原型批评方法运用的典范。该著突破了传统研究将拜伦囿于浪漫主义诗人的狭隘定位，以及对“拜伦式英雄”的一般性描述，而是深入探究这一文学形象的心理原型。通过对拜伦生平经历、创作心理的考察，揭示了“拜伦式英雄”的双重原型来源：拿破仑式的反抗型英雄与尼采“超人”哲学原型。这种研究视角的拓展，得益于原型批评方法对文化无意识和集体心理结构的关注。当然，与荣格（Carl Jung）心理学强调的“集体无意识”原型不同，该著更关注的是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形成的“个体原型”及其对后世思想的影响。

叙事学方法则主要应用于对劳伦斯小说研究。作者对《虹》的分析超越了传统研究对主题、人物的关注，而是将焦点转向小说叙事结构。这种复合结构，不是纯技巧的运作，更倾向于内容本身，直入小说纷繁存在事实的内核，把存在中的各式人物联系起来，形成多种类意义上的对位。这一分析揭示了劳伦斯小说多重复合式叙述结构不仅是艺术手法的探索，更是对现代人存在状态复杂性的艺术呈现。对《恋爱中的女人》中“深度对话”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识。该著发现，劳伦斯小说中人物间的对话往往超越了情节推进的功能，成为探索人性深层矛盾的哲学对话。这种分析借鉴了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对话理论，但又超越了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经典阐释，将对话理论运用于现代主义小说的形式分析。

跨文化传播学方法在对安徒生童话和马克·吐温小说在中国传播史考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对安徒生童话百年传播史的梳理，不仅是文学史实的考证，揭示了跨文化传播的选择性机制。五四时期强调“童心”，革命时期凸显“批判性”，新时期重新发现“诗意”反映了“民族期待视野”在跨文化接受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对安徒生童话的认识，也论证了外来文学在异质文化中的接受总是“误读”与“创造性阐释”并存的过程，这种“误读”本身就是经典意义生成的重要机制。

以上三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并非机械拼凑，而是根据研究对象灵活调整。原型批评用于揭示作家创作的深层心理动因，叙事学主要分析文本形式创新，传播学适用于考察经典跨文化生成。《创新》对不同方法的娴熟运用，展现了作者深厚的理论素养和方法论自觉。

（二）历时性考察与共时性分析的方法论张力

《创新》在方法运用上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将历时性考察与共时性分析有机结合。历时性考察关注文学现象的历史演变过程，共时性分析则主要分析特定历史时刻不同文学现象的结构关系。这一方法论区分源自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对语言研究的二元划分。然而，索绪尔强调历时与共时的严格分离，认为语言的历史演变（历时）与语言的系统结构（共时）应

当分别研究。¹《创新》则突破了这一二元对立，在文学研究中实现了历时与共时的辩证统一。

《创新》对“现实主义中国70年传播”的考察，充分运用了历时性方法。将1949年以来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划分为不同阶段：20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独尊，80年代西方现代派冲击下现实主义“边缘化”，90年代以来对现实主义的重新认识。这一历时性梳理不仅是文学史实的考证，而且揭示了现实主义概念内涵的历史演变。蒋承勇指出，我国学界所谓的现实主义“独尊”，实际上独尊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变体”（225-226），而非19世纪现实主义的本源性内涵。因此，在考察文学思潮的传播时，不能简单将同一名称的概念等同起来，而必须辨析其历史语境中的具体内涵。

与此同时，《创新》对19世纪六大文学思潮的研究则体现了鲜明的共时性分析特征。该著并非将这些思潮作为孤立历史现象分别考察，而是揭示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蒋承勇指出，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演进，贯穿一条鲜明的“人学”逻辑链条，“将看似断裂的不同思潮整合为一个有机的结构体系”（333）。浪漫主义追求情感的解放，现实主义追求认识的真实，自然主义追求科学的客观，象征主义追求精神的超越，唯美主义追求艺术的自律，颓废派则在价值虚无中探索新的可能。这些不同的文学追求，共同构成了19世纪西方社会对“人”的多维度探索。这种共时性的结构分析，有助于在更高层次理论层面把握19世纪文学整体面貌。

历时与共时的结合，在《创新》对浪漫主义“自由”观念的研究中达到了高度统一。该著既考察了浪漫主义“自由”观念的历史起源，从18世纪感伤主义、狂飙突进运动到法国大革命的复杂影响，又分析了这一观念在浪漫主义思潮内部的多维展开，个人自由、宗教自由、政治自由、艺术自由等不同层面的“自由”诉求形成了浪漫主义的复杂结构。历时性梳理揭示了“自由”观念的历史生成过程，共时性分析则展现了这一观念的内在结构关系。两种方法的有机结合，使得对浪漫主义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理论深度。

这种方法论张力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作者对文学史研究本质的深刻理解。文学史既是历史的，又是结构的；既要考察文学现象的时间演变，又要揭示不同现象的空间关系。《创新》对历时与共时方法的成功整合，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通过原型批评、叙事学、传播学等多元方法的综合运用，以及历时性考察与共时性分析的辩证结合，《创新》在实践层面建构了一套可操作的经典重估研究范式。这一范式的核心特征在于方法的开放性与运用的灵活性，即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选择合适的方法，根据研究问题的复杂性综合运用

1 参见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edited by Charles Bally and Albert Sechehaye, translated by Wade Baskin,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9.

多种方法，避免方法论的教条主义和僵化。这种实践范式对于当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四、学术贡献与学科意义：经典重估的范式转换

《创新》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对具体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的创新性阐释，还在于其对整个文学研究领域的方法论贡献。该著在“重写文学史”的推进、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深化两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创新》的学科意义并非外在于其具体研究内容，而是体现在其研究理念和方法论实践。正是通过对经典重估的系统探索，该著作为相关学科领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和实践范例。正如绪论中所言，“经典重估不仅是一个文学批评问题，更是一个关涉文学史书写、学科建设的全局性问题”（22）。

（一）对“重写文学史”的方法论贡献

“重写文学史”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界的重要学术议题。这一议题的提出，源于对既有文学史叙事模式的反思。传统文学史往往以线性进化论为框架，以现实主义为唯一正统，忽视了文学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1988年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等学者发起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1993年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都是“重写文学史”的重要实践。然而，如何在理论和方法上真正实现文学史的“重写”，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索的问题。

《创新》为“重写文学史”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资源。该著对文学思潮的研究直接回应了文学史书写中的核心问题：如何处理文学史的连续性与断裂性？如何理解不同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如何避免单一标准对文学史的简化？该著强调，“西方诸多文学思潮在外表的“断裂”式差异中存在着人文—审美的深度关联，由此构成血脉相连的文学史有机整体”（15）。因此，文学史的书写既要尊重不同思潮的独特性，又要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既要看到文学发展的断裂与变革，又要发现其中的传承与延续。

更为重要的是，《创新》对“写实”概念的辨析，为重新评价现实主义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该著关于“写实”作为“变数”概念的论述，打破了将现实主义视为固定创作方法的僵化理解，为现实主义在20世纪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理论解释。在肯定19世纪现实主义经典地位的同时，承认20世纪各种新形态现实主义的合法性。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学史观，正是“重写文学史”所需要的理论基础。

《创新》对跨文化传播中经典再生成机制的揭示，则为“重写外国文学史”提供了独特方法论视角。在书写外国文学史时，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学界经典体系和价值判断，应基于中国读者接受史、中国学者阐释史，建构具有中国气派的外国文学史叙事。这种方法论自觉，对于建构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的理论深化

201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将“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设立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这一调整反映了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新趋势。《创新》下编专门讨论了“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的学科定位问题，明确该二级学科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共性与差异。两者都须以比较文学理论与方法展开国别文学研究，而跨文化研究与世界文学是不同的追求目标、研究范围及途径。这种学科定位判断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创新》对“跨文化”概念的阐发亦深化了对比较文学学科本质的认识。该著强调，“跨文化研究不仅指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的跨文化，更重要的是研究者的跨文化视野、意识、知识储备、背景参照”（25）。这一论述揭示了“跨文化”的方法论本质：它不是一种研究对象的分类，而是一种研究立场和思维方式。中国学者研究西方文学，明显处于跨文化位置；如何将这种跨文化位置转化为研究优势，需要方法论自觉。《创新》正是通过对西方文学经典的跨文化重估实践，展示了这种方法论自觉的学术价值。

《创新》对“世界文学”概念的辨析，也为比较文学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该著在绪论中通过对歌德、马克思、恩格斯等人“世界文学”论述的梳理，指出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时代”的人类文学，“并不是消解民族特性与差异性文学之大一统，而是带有不同文明与文化印记的、多元化的民族文学同生共存的联合体”（26）。这一阐释纠正了将“世界文学”理解为文学“世界主义”的偏颇，强调了民族文学的多样性是世界文学的基础。比较文学不是要消解民族文学的特殊性，而是要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促进不同文学传统对话与交流。

《创新》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还体现在其对学科方法论体系的建构。通过对原型批评、叙事学、跨文化传播学等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展示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的方法论特征。比较文学的优势不在于拥有某种独特研究方法，而在于能根据研究对象特点灵活运用各种方法，实现跨学科、跨文化、跨语言的综合研究。《创新》方法论实践，为比较文学学科的方法论建设提供了成功范例。

从“重写文学史”到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创新》的学术贡献体现了从具体研究到学科建构的理论自觉。这种学科意识使该著超越了一般性研究专著，成为具有学科建设意义的理论著作。

五、结语：经典重估的持续性与开放性

《经典重估与西方文学研究方法创新》一书以系统的理论建构、立体的方法论架构和丰富的研究实践，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经典重估的成功范例。在理论层面，突破了本质主义经典观，确立了经典的历史生成性和跨

文化建构性；在方法论层面，构建了微观文本细读、中观思潮谱系、宏观理论反思的三重架构，形成了可操作的研究范式；在实践层面，通过对西方文学经典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的创新性阐释，展示了这一方法论体系的有效性。

《创新》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其具体的研究成果，还在于其所体现的方法论自觉和学科意识。该著对“重写文学史”的方法论贡献，对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的理论深化，都体现了作者对当代人文学术发展方向的深刻把握。在理论移植盛行的时代，《创新》坚持立足本土问题意识，结合中国学界的研究实际，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研究方法论体系。这种学术立场本身就是对“经典重估”理念的实践：不是简单接受西方学界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而是基于自身学术传统和现实需求，创造性建构新的理论话语。

当然，任何学术研究都有其可拓展的空间。在数字人文蓬勃发展的今天，如何将大数据分析、文本挖掘等新技术整合进经典重估的方法论体系，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方向。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视角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如何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经典谱系，建构更具包容性的世界文学经典体系，也是经典重估需要回应的新课题。此外，随着生态批评、情感研究等新兴理论范式的兴起，经典重估可以获得哪些新的阐释维度，也值得学界持续关注。

经典重估不是一劳永逸的工程，而是一个持续开放的过程。“每个时代都有重估经典的必要”（1）。《创新》的出版不是经典重估的终点，而是新一轮探索的起点。该著所建构的方法论体系，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所展示的学术范例，为后来者指明了可行的研究路径。在文学边缘化与“经典重估”呼声并存的时代，《创新》以其理论深度、方法论创新和学术视野的开阔，向我们昭示，经典重估不是对过去的简单回归，而是以新时期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论工具，发现经典的新价值、新意义，从而实现文学研究的创新性发展。这正是《创新》一书的核心价值所在。

Works Cited

- Bloom, Harold.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94.
- Bourdieu, Pierre.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translated by Susan Emanuel.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6.
- 蒋承勇：《经典重估与西方文学研究方法创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Jiang Chengyong. *Reassessment of Classics and Innovation in Research Methods of Western Literatur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20.]
- Saussure, Ferdinand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edited by Charles Bally and Albert Sechehaye, translated by Wade Baskin.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9.